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编

秦汉史



QINHAN
SHILUNCONG

第九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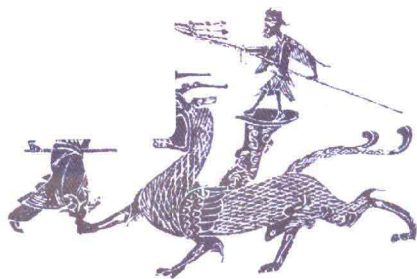
三秦出版社

£232.7/1

秦汉史论丛

第九辑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编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史论丛. 第9辑 /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7
ISBN 7-80628-850-3

I. 秦... II. 中... III. 中国—古代史—秦汉时代
—学术会议—文集 IV. K23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9788 号

秦汉史论丛(第九辑)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1.125
字 数 52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850-3/K·374
定 价 45.00 元

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 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代前言)

周天游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已经隆重开幕了，借此机会，我谨代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咸阳师范学院等会议承办单位，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参加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各位来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预祝本届年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整整 20 年了，今年进入第 21 个春秋。本届年会的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隆重纪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让我们回顾所走过的路程，总结我们取得的成绩、经验和不足，才能更加明确方向，鼓起更大的干劲，为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我们最大的贡献。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是在扫除了“文革”的阴霾，祖国处于改通人和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之时成立的，也是全国史学界中创办较早、比较成功的学会之一。回首过去，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了二十年的不懈努力，研究会起到了它应当起的作用，广大会员在学术研究中硕果累累，成就斐然。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以及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重大秦汉考古成果的发现，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相继问世，这为秦汉史的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资料，也为秦汉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此时，如何在掌握新资料的基础上，把秦汉史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加强秦汉史学界的联系和学术交流，就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1981年9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在西安成立。

秦汉史研究会自成立以来，每隔两三年召开一届年会。经过了1981年的西安年会、1984年的成都年会、1986年的安徽芜湖年会、1988年的徐州年会、1991年的山东泰安年会、1993年的江西南昌年会、1996年的广州年会和三年前的云南昆明年会之后，如今又转回西安，正好对本会二十年来的发展和研究成果做一个检阅。

在历届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秦汉史学者汇聚一堂，大家都拿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相互切磋和商榷。据统计，历年年会共收到600多篇论文。在会上，代表们就一些史学界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讨论的问题范围极广，涉及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周边民族、中外关系、人物研究以及简牍帛书等诸多方面。很多问题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和讨论得到了深化，并反映到相应的研究成果之中。近年来，年会讨论的主题又增加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推动和促进了秦汉史研究向更深和更广的方向发展，如第五届年会上，对泰山和泰山文化进行探讨；第七届年会增设了“秦汉时期岭南的经济与文化”的主题，充分利用岭南的秦汉考古成果，结合文献资料对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制度、思想、宗教、建筑等多个领域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并且将岭南地区跟周边区域和中原进行比较研究；第八届年会则主要关注“西南夷”的族属、经济、交通、及当时的边疆民族思想

进行探讨。如此集中的对某一地区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拓宽了传统的秦汉史研究范围，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地方的学术、文化建设。年会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成为会员们学术交流的极好场合，也成为推动秦汉史研究工作向前迈进的巨大能量源。

从第三届年会开始，与会代表扩大到日本、美国、韩国和台、港、澳地区。特别是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秦汉史研究学者更是多次组团参加。在第五届年会上有论文介绍韩国的秦汉史研究现状及课题。在第七届年会上，台湾地区的秦汉史专家韩复智先生和日本的杉本宪司先生分别做报告介绍台湾和日本的秦汉史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方向，使我们深受启发。这标志着研究会的影响扩大到了国际范围。

每届年会之后，研究会都组织编辑出版《秦汉史论丛》，把年会上功力深厚、见解独特的论文收集整理，以求在更广的范围内起到学术交流的作用，至今已经出版了8辑。这8辑《秦汉史论丛》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秦汉史研究的最新水平，成为学者们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园地。跟80年代之前相比，近20年的秦汉史研究在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国内共发表有关秦汉史研究性论文和考古报告5000多篇，出版专著200多部。平均每年的成果数量远远超过研究会建立之前，而且在各个领域都有突破性进展。这累累硕果中，既有老一辈学者的心血结晶，也有我会会员的辛勤奉献。

对于秦汉时期综合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马非百先生的《秦集史》，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汉史》，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四卷、王云度先生的《秦史编年》、王云度与张文立先生合著的《秦帝国史》等。这些成果，至今仍是国内地秦汉史研究水平的标志性著作。

对于秦汉时期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官制、法律制度、兵制、政区地理、政治变动和社会基层组织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关于官制的研究论著中引人注目的有两本：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著述的《秦汉官制史稿》和黄留珠先生著述的《秦汉仕进制度》。关于爵制的研究，代表是柳春藩先生的《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和朱绍侯先生的《军功爵制研究》。对政治群体进行考察的有刘修明的《从崩溃到中兴》、陈玉屏的《西汉前期的政坛》和李开元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等。最近有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随着睡虎地秦简法律文布的公布，秦朝的法律制度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一批成果相继问世。栗劲先生著述的《秦律通论》是其中的代表作。政区地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是周振鹤著述的《西汉政区地理》和李晓杰著述的《东汉政区地理》。

社会经济问题一直是史家研究的热点之一，在秦汉史研究中也不例外，对社会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形式、货币、赋税徭役、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在这方面用力最深的是林甘泉先生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和《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钱剑夫先生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朱绍侯先生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高敏先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张传玺先生的《秦汉问题研究》，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等。另外葛剑雄先生的《西汉人口地理》、王子今先生的《秦汉交通史稿》则开辟了秦汉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课题。

近年来，秦汉社会和文化成为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其特点是，不仅社会群体研究继续受到重视，而且日常生活的研究也开始受到注意。对于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研究集中在地主、“隶臣妾”、佃客、儒生、方士、游侠等方面。许多学者结合出土的简牍资料对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及家庭婚姻等问题进行了

探讨。代表作品有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马新的《秦汉乡村社会史》和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等。关于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的成就更多，熊铁基先生的《秦汉文化志》和新著《秦汉新道家》，李学勤先生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合著的《秦汉社会文明》，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等多有创见。

对传世文献的校释、校注和点校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展，特点是覆盖面宽阔，尤以史类和子类书籍最为着力。重要著作有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新语校注》和《盐铁论校注》，陈直先生的《三辅黄图校证》，何清谷先生的《三辅黄图校注》，陈奇猷先生的《吕氏春秋校释》，吴树平先生的《风俗通义校释》、《东观汉记校注》，周天游的《八家后汉书集注》、《后汉纪校注》和《汉官六种》，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注图补》，李发舜等点校的《方言笺疏》，张双棣的《淮南子校释》，彭铎的《潜夫论笺》等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对于秦汉简牍整理、研究的有陈直先生的《居延汉简研究》，李均明、何双全先生的《散见简牍合集》，高敏、谢桂华、林梅村等先生也对秦汉简牍的整理、研究做出了重要成就。民族史的代表之作是林干的《匈奴通史》，木芹的《两汉民族关系史》等等。

秦汉史研究会的成员不仅以硕果累累引人注目，他们呈现的蓬勃朝气更令人欣慰。如我们的会员，由原来的数十人增加到现在的近四百人，遍及全国各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出版单位。国内绝大多数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都是我会的会员。他们中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起着学科带头人的作用；而一大批聪慧睿智的中青年学者，笔耕不辍，担当起了学术中坚的角色；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初出茅庐的学者，他们是我们研究会的新鲜血液，也是秦汉史研究事业明天的希望。在如今处处

“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备受冷落。尽管这样，我们的会员和学者们甘于坐冷板凳，甘于承受研究的辛苦与劳累，甘于忍受做学问的清贫与寂寞，在此，我们向这些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先生们致以诚挚的敬意。正是他们的付出与牺牲，才换来了我国史学的繁荣。我会的会员之间关系融洽，很多会员以年会为桥梁建立起了很深厚的友谊。他们相互联系密切，在学术上经常进行合作。很多煌煌巨著就是相互合作的结果。正因为我们拥有这样一支团结、进取、充满朝气的会员队伍，有学者们孜孜以求的不断求索，我们的秦汉史研究才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不仅推动着国内秦汉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还大大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特别是近几届年会上，海外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带给我们一些国外最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开创了新的历史研究视角；海外的学者也通过会议接触到我们的最新考古资料，吸收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秦汉史研究的更新、更多、更广的研究成果，使秦汉史研究更加富于朝气。

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推动下，很多与秦汉史有关的活动也蓬勃开展，比如一些地区的秦文化研究会和汉文化研究会相继成立，秦俑博物馆也通过秦俑秦文化研究会举办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尽管这些研究会不是我们的分会，但是他们的很多会员也是我们的会员，组织之间和会员之间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秦汉史研究会取得的成绩是会员们辛勤耕耘的结果，也离不开组织者的奔波劳累。我的导师陈直先生是研究会的主要发起者和倡议者之一，并为研究会的成立付出了大量心血，可惜在秦汉史研究会即将成立之前不幸因病逝世；首任会长林甘泉先生亲自参加了研究会的组织和筹建工作，而且带领我们走过了最初的艰难时光。继任的林剑鸣先生、高敏先生和张荣芳先生都为研究会

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每届还有若干名副会长，他们共同完成了大量的烦琐工作。我们研究会一直聘请国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担任顾问，指导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在这里，谨向他们的工作和奉献精神表示深深的谢意。值得提出的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先后承担了大会秘书处的很多具体工作，特别是昆明年会会议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在中断几年以后恢复正常编发，受到了广大会员的欢迎和称赞，研究会的成就中也包含着他们的辛劳。

回首过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秦汉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而自豪。相信只要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奋进，一定能够把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丰碑，毫无愧色地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谢谢大家。

2002年8月11日

目 录

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

- 报告(代前言) 周天游 (1)
1. 早期秦文化特征形成的初步考察 张天恩 (1)
2. 论“汉家制度” 安作璋 刘德增 (13)
3. 从秦皇到汉武历史急剧震荡的深层含义
——论中国皇帝制的生态 管东贵 (28)
4. 从选官制度看两汉宗族之隆兴 赵 沛 (45)
5. 再论“矫制”
——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一) 孙家洲 (60)
6. 伦理制衡与汉代政治 王 健 (78)
7. 论汉代特进 田延峰 (85)
8. 西汉令长群体初探 岳庆平 邹水杰 (95)
9. 论东汉末年汝南郡的月旦评 朱子彦 (111)
10. 《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 宋 杰 (127)
11. 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
——张家山汉简研究之一 廖伯源 (167)
12. 汉代廷尉考述 沈 刚 (186)
13. 东汉持节问题探讨 张鹤泉 (200)

14. 秦汉时期的始傅、始役、终役的年龄研究
..... 丁光勋 (223)
15.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私奴婢的社会地位 王彦辉 (232)
16. 秦汉律所反映的后子制和继承法 尹在硕 (247)
17. 张家山汉简所见制约行政权的法律 李均明 (271)
18. 秦汉的“书记” 金 焯 (284)
19. 汉代庙制问题探讨 王柏中 (303)
20. 关于秦律、汉律中的“三环”问题 刘华祝 (319)
21. 秦律、汉律中的杀人罪类型
——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
..... 水间大辅 (326)
22. 《二年律令·行书律》浅析 张俊民 (335)
23. 张家山汉简盗律考 曹旅宁 (348)
24. 试析张家山简《盖庐》中的兵阴阳之术 田旭东 (362)
25. 关于西汉“诸公”浅析 东晋次 (371)
26. 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 王子今 (382)
27. 西汉前半期的城市与城市管理 江村治树 (396)
28. 秦汉王权与农业 鹤间和幸 (405)
29. 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及其发展水平
之评估 黄今言 王福昌 (415)
30. 略论秦汉女性的经济地位 崔 锐 (437)
31. 论秦汉时期宁夏畜牧业的发展 张维慎 (448)
32.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初期平价制度 温乐平 (457)
33. 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 马 新 (471)
34. “0.6折合法”在先秦、秦汉农业生产中
计量的应用 杨兆荣 (485)

-
35. 秦咸阳和汉长安的城市水利与环境 …… 村松弘一 (495)
36. 睡虎地秦简《语书》与墨家思想 …… 池田知久 (509)
37.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释例 …… 杨天宇 (557)
38. “吴钩”为“吴戈”论 …… 张仲立 (582)
39. 大夏蛇人与战国蛇神之比较研究 …… 杨 谨 (590)
40. 对河西汉塞的几点认识 …… 吴弼骧 (614)
41. 考古资料所见先秦时期秦人交通陕甘的
 几条路线 …… 史党社 田 静 (628)
42.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
 学术讨论会综述 …… 田 静 张铭治 (642)
- 附录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
 目录 …… (653)
- 后记 …… (663)

早期秦文化特征形成的初步考察

张天恩

秦民族的历史文化，一直吸引着学术界的目光。近二十余年来，陕西宝鸡一带春秋时期和甘肃东部西周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现，尤其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确认，使比较虚幻的秦人早期历史之最重要部分立即有了着落，从而使那些对秦人早期历史持怀疑态度，以为其活动区域不过陇山以西的一类见解，自然地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因之也导致了过分夸大早期秦人实力及其文化蕴涵量的倾向，把陇山以西的周文化遗存，甚至其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一概与秦文化相拼接。以致忽视了甘肃东部地区作为周之西陲，本应是周文化的势力范围，到西周中期偏晚阶段的孝王时，非子为王室养马有功，才获得了地位卑微的“附庸”这样一个名号的事实，在此之前不大可能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当然，以为秦文化到春秋中期才形成自身风格的看法，与已经了解到的考古资料同样相悖。

因此，分析梳理陇山以西周代文化遗存的基本面貌，了解早期秦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原因和时间范围，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一、早期秦文化的特征

能确切地与秦早期相对应的文化遗存，年代范围基本在春秋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发现有陇县边家庄^[1]、店子^[2]、宝鸡市姜城堡^[3]、谭家村^[4]、宝鸡县西高泉^[5]、南阳^[6]、灵台景家庄等墓地^[7]，发掘者分别推断有年代相当于春秋早期的秦墓。对此学术界无异议，并普遍认为姜城堡墓可到春秋早期的早段。与姜城堡墓年代相当，或者还有略早墓葬存在之墓地，只有礼县大堡子山的秦西山陵区，一般认为已发现的有秦襄公、文公的墓。

归纳这些墓地和有关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明显地注意到，早期秦文化主要特征表现在文化遗物和墓葬两个方面。

(一) 遗物

主要有陶器和铜器。

陶器为鬲、盆、豆、罐，是墓葬中较为基本的组合形式，有些墓出鼎、簋、盃（或盘、匜）等仿铜陶礼器，也有出甗者。虽然鬲、盆、豆、罐的组合在西周中晚期的墓葬中已经出现，但呈大喇叭口的鼓肩罐，足尖出现麻点纹的陶鬲，却从不见于周墓。

铜器有鼎、簋、壶、盃（或盘、匜）、甗，是具有一定级别的墓葬中常见组合形式，有些墓葬的组合并不完整。同样的组合也见于西周墓，但组合完整的墓内几乎少不了扁体盃（或盘、匜），却是早期秦墓的一个显著特点。鼎基本为浅坠腹、近平底、矮蹄足，与西周晚期墓常见深腹圜底鼎有较大的差别。甗多为方形、分体，壶只有方体，未见圆形，均不同于西周。

另外，石圭或陶圭是墓葬中普遍随葬的一类器物。

(二) 墓葬

统计有关墓地属于春秋早期的秦墓，数量为 30 座左右，据随葬品的不同，可以区别为陶器墓和铜器墓。

陶器墓的特点，主要是头朝西的东西向墓，基本均为屈肢葬，有木棺或棺椁，部分带腰坑，或设有头箱，随葬品置于其中。这类墓葬以西高泉墓地及谭家村、店子一期偏早墓葬为代表，我们不妨称为西高泉模式。

铜器墓尚可分为两类：

其一，为南阳模式。均是头朝西的东西向墓，仰身直肢葬，带腰坑，棺椁具备。形制巨大的墓葬有殉人，有墓道，如大堡子山墓地；

其二，为边家庄模式。基本是头朝北的南北向墓，仰身直肢葬，无腰坑和墓道，未见殉人，随葬品置于二层台上。

二、有关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简析

与早期秦文化有涉的地域比较清楚，主要是陕西的关中西部 and 甘肃东部的陇山以西地区（包括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文献记载和考古可以互为印证。

（一）关中西部地区

关中西部在西周一代都是畿内要地，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可以说只有一类，那就是典型的周文化。在西周中期以前，宝鸡附近发现过以茹家庄、竹园沟等处墓地、遗址为代表的遗存^[8]。这种与早期巴蜀文化关系密切，并受到周文化强烈影响的遗存，西周中期后即已销声匿迹，可以说与秦文化没有什么联系。

周文化在关中西部宝鸡周围与在其都邑岐、丰地区保持一致的面貌和发展步伐。生活用具中的鬲、盆、豆、罐、甗等，铜礼器的鼎、鬲、簋、壶、盃（或盘、匜）等，基本都有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如果从器物种类上看，几乎全被早期秦文化所继承。但后者沿用了哪一阶段周文化器物的风格，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后文进行专论，此不赘。

反映在埋葬习俗方面，包括关中西部在内的周文化特征比较一致。可以说绝大多数墓都是头朝北的南北向，仰身直肢葬，无腰坑，无殉人。无论墓葬的大小，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是大墓有墓道，棺槨具备，随葬品有丰富的青铜器、玉器等，小墓无墓道，只有木棺，随葬品几乎只有陶器。

(二) 陇山以西地区

这一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素称复杂。西周时期，属于周王朝的西部边陲，文化类型亦较多样化。在与秦人有关的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目前可知的文化遗存，至少有周文化和寺洼文化两大类。

寺洼文化是商周时期活跃在西北地区的重要青铜文化，足迹几乎遍及甘肃东部地区，西起洮河流域，东至泾河中上游，东南到西汉水上游及嘉陵江上游，都能见到该文化的存在。在周文化统治中心的关中西部边隅，也存在寺洼文化的影响，宝鸡市蒙峪沟口^[9]、凤县龙口^[10]、宝鸡县官道原^[11]等遗址，分别发现过寺洼墓葬或陶器，并提供了与西周遗物共存的证据。

该文化的分布与秦人早期活动的区域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但文化面貌差距较远，基本找不到与秦文化的线索。

就文化特征而言，寺洼文化与甘谷毛家坪遗址 B 组遗存^[12]似有关联，也许是后者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各地战国秦墓中所能见到的铲足鬲，很可能是来自毛家坪 B 组遗存。看来，寺洼文化的后继者，却是构成晚期秦文化特征的因素之一。

陇山以西的周文化遗存不同于关中，面貌不完全一致。从已经发现的考古材料分析，初步可区分为三类：

其一，我们暂称“西河滩类型”，是与关中地区周文化面貌比较一致的遗存。

这类遗存发现得很早，但资料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知之者甚少。据有关文章介绍，1965—1966 年，甘肃省文物队在陇西县